

2/10

资中县文史资料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第七辑



政协资中县委员会 编
资中县修志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

目 录

史志资料

- 猪鬃.....县外贸站专志组 (1)
- 资州书院概述.....周叔平 (3)
- 资中县抗敌后援会活动情况.....官钧 王志康 蔡锐修 (4)
- 一九三七年省中学潮后记.....蔡锐修 (6)

人物简介

- 资中人物志.....周叔平 (10)
- 《藏汉大辞典》编者之一——杨承丕事略.....谈忠群 (13)
- 我所知道的范长江同志.....周嗣荣 (20)

资中风物

- 东岩.....王志行 (22)

武庙.....	王志行 (24)
老寨山麓出平湖.....	何菊基 游泽麟 张绍成 刘盛之 (25)
青山庙.....	李良玉 (25)
高禅叠寺疑龙旋.....	冷观军 游泽麟 张绍成 刘盛之 (26)

资中风土

资中名小食.....	王志康 (27)
------------	----------

场(镇)简介

重龙镇概况.....	周嗣荣整理 (29)
归德场概况.....	吴贤祧 (30)
甘露场概况.....	罗盛隆 (32)

修志动态

关于座谈审议《资中县粮食志略》的简况.....	李凌霄 (33)
-------------------------	----------

猪鬃

俗话说，猪鬃出在猪身上。猪只生产兴旺发达，鬃源就充裕不竭。人们常听到“猪多毛多”的佳话。生猪被人们视为六畜之首，誉之为“全身都是宝”，是我县农民主要副业之一。

猪鬃光润无杂质，附着力小、散热性强，可制作军工用品、民用品和医药用品，同时，下脚还可作肥料和化学原料。

就我县来说，生猪不仅是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所产的猪鬃还是大宗传统的出口商品，也是财政税收、外汇的重要一环，占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

我国猪鬃出口贸易，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销路遍及五大洲的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总销量的四分之三以上，质量为世界各国之冠，颇受国外外商的欢迎。

我省生产的出口猪鬃解放前名曰“虎牌鬃”，解放后名叫“重庆鬃”，简称“渝鬃”，主要经上海口岸输出。年出口量万箱左右，近几年来已突破三万箱大关，总产值约两千万元。渝鬃历来享有加工精致，品质优良的国际盛誉。

我县猪鬃在1920年前，仅有小贩数家，搞点小买卖活动。1920年后，相继设有“复兴号”、“同义昌”等商号，经营生鬃、肠衣、牛羊皮、兔皮、羽毛等综合性业务，设有猪鬃专业的商户，也设有猪鬃加工厂，主要购销生鬃，销往重庆加工后，再转口岸外销。年出口量一直都徘徊在60箱左右。解放后，认真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把发展生猪，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多创外汇，纳入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了外贸机构，办起了猪鬃加工厂。从此开创了熟鬃生产的历史，生猪生产蒸蒸日上，鬃毛源源不绝，商品量稳步上升，最高年销量已达784箱，给外贸事业也带来了新的发展。

猪鬃生产流程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资中1950年成立了集股合伙私营“合生猪鬃厂”（已停），1980年成立了社办“谷田猪鬃厂”，开始了熟鬃生产的历史新篇章。但生产设备、工艺操作、生产规模等都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生产发展的要求，因此，有待于扩大和改进。

一、原料及主要设备

猪鬃生产的原料为生鬃。主要设备有泡洗池、挥毛机、烘房、缠板、打板、工作台、梳子、毛夹、天秤等。

二、生产流程

主要有水梳、缠板、篾工、花毛、检验等工序。

水梳：将晾晒干的生鬃倒入盛有清水的大池，泡渍数天（具体时间看气候、温度而定），再用木耙搅拌、脚踏，直至洗净为止。取出洗净的鬃沥去水，用挥毛机甩去水滴和毛渣，然后送进烤房烘干，再取出蒸伸，再烘干。

缠板：将烘干的熟鬃倒入抬筛，筛选清理、翻梳、剔掉下脚料，把合格的熟鬃用盖线①束成一个个小把。

篓工：把上面两道工序完成的熟鬃按规定的长短规格清理、揉正、束紧，束成大小相等的小捆，系上盖线。

花毛：手工用毛夹将束好的小把不同规格熟鬃拔除白、黄、霉等杂鬃而成为商品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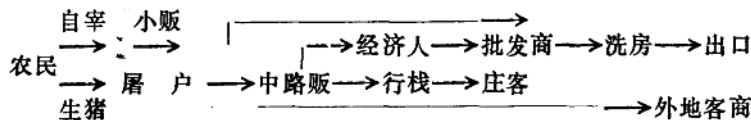
检验：将车间送来的成品鬃分批次地按国家标样，进行初检，不合格者返工再制，合格的送交重庆畜产公司复检，商检局检验合格后方能装箱出口。

猪 鬃 贸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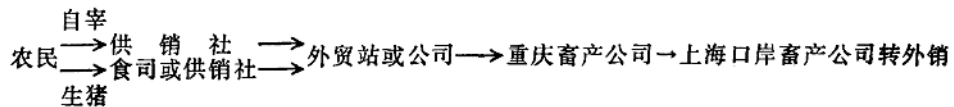
猪鬃随着生猪出槽淡旺季而异，冬春二季货源最多，毛质最佳，购销甚旺。夏秋极淡，毛质低劣，交易清淡。

流通规律：一般是由生产者经商业或外贸环节，再加工洗净分级装箱。最后运口岸公司出口，具体流通渠道如图：

解放前：



解放后：



猪鬃在解放前分黑、白二种。剪梢二七规格装箱②；解放后分黑、白和杂色（花、黄、霉）三种一八规格留梢装箱③。

外包装用装一百市斤的标准木箱，内垫防潮纸，小包用白纸印有渝鬃商标不同规格的各种猪鬃，依次按规格、数量配齐装箱，并洒上樟脑粉以防虫蛀，装箱妥善钉封。

我县猪鬃输出路线

我县猪鬃抗战前运销重庆；抗战期中运销宜宾、泸州；抗战胜利后恢复战前路线。现在仍然运销重庆“畜产进出口公司”，再转上海口岸公司外销。

解放前输出的叫“虎牌鬃”，据史料①记载，最高年输出量为67.8箱，最低年输出量为50箱。解放后的渝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均输出量为27箱（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平均输出量为412.7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平均输出量为461箱；1981年至1983年平均输出量为424.7箱。

白鬃经济价值较黑鬃高，但产量历来有限，我县白鬃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5至20箱之间。现在有“人造猪鬃”，黑、白颜色的竞争不甚明显了，国际之间竞争激烈的是熟鬃质量；还有天然鬃与人造猪鬃的竞争。当前必须正确贯彻中央关于“质量第一，以优取胜”的方针，这就有待于研究发展人造猪鬃，才能使我省我县立于不败之地。

注：

- ①、盖线：缠一个一个熟鬃所用的棉线。
- ②、剪梢二七规格装箱：将二十七种规格的熟鬃剪去尖尖一头。
- ③、一八规格留梢装箱：即一十八种熟鬃的规格不剪去尖尖可以装箱出口。
- ④、史料记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一期，《四川土特产品物历史资料》之一。

资中县外贸站站志编写组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资州书院概述

蜀自文翁创石室（旧址在今成都第四中学）文学之盛，比于齐鲁。此后蜀地各县亦立学舍以深造士子，大开文风，后更名为书院。书院主讲者称山长，多为本地或外地名儒硕士，德高望重的人。

珠江书院。于清初建立，旧在资城东关内，乾隆五十三年，建于文昌宫，道光四年又移东关外，十一年复移于大东街学宫旧所（旧址即今资中第一中学）。清代书院山长，如咸丰辛亥科举人欧阳荣赐，咸丰乙卯科举人何袞，光绪戊子科举人李文科均当时资州名儒，品行醇正，学识渊博，为州人所推重，先后相继主讲书院，生徒有成就的甚多，考上秀才或举人的不少。

艺风书院。道光十七年，州牧舒翼以士子思入学者日益增多，乃于资城北关外状元祠（祀南宋初资中状元赵遼字庄叔）添置“栖云书院”（旧址在今资中师范校）。光绪甲申州牧高培谷改栖云书院为艺风书院。高以资中文化朴陋，时艺八股文外，鲜所窥及，于是购经、史、子、集一万八千余卷置于艺风书院，益礼聘蜀中名儒宋育仁、吴之英、蒲莹和廖平等以次主讲，每岁生徒来学者以数百计，当时文风之盛，甲于川南。生徒中著作特出者，皆选刊成册以行世，兴学之功，至今对高培谷犹称道不已。

还有：

凤鸣书院，在资城西关外。

火峰书院，在资城南。

龙江书院，在蔡家场街上。

资东书院，在太平镇交子湾。

菁莪书院，在铁佛场街上。

罗泉书院，在罗泉分县（即今罗泉井）街上。

珠溪书院，在球溪镇上。

资州除上述书院外，各地还有乡学之教，即世所谓“义学”，来学生徒，大率多贫困家庭，要求以识字缮写为止境，至于成绩优良、升入书院以求深造者亦多。

注：凡了解或掌握有我县书院的资料者，请撰稿寄给我处。

周叔平

资中县抗敌后援会活动情况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称霸全球。全国人民十分愤怒，各地先后纷纷成立抗日组织，宣传日本侵华罪行，激发人民抗日热情，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资中县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正式成立，开展抗日斗争。资中四川省立第六中学校由学生会主席周能辉任会长，主持全会工作。李钧伯、官钧任宣传组话剧股股长，蔡锐修任歌咏股股长。资中县立女子中学校由学生李志聪任会长，李应华任宣传组话剧股股长。这两所学校推动当时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将当时活动情况简述于下：

一、组织“晨呼队”，激发全县人民的抗日热情。

“抗敌后援会”成立不久，发动城区中小学师生，组织成立“晨呼队”。每天早上天刚破晓的时刻，成群结队的中小学师生排着长长的队伍，奔向街头。整齐的步伐，嘹亮的歌声，把酣睡的人们从梦中呼醒过来。在《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等雄壮激昂和凄凉悲愤的歌声的激励下，全城人民就都披衣起床，各自作好踏上工作岗位的准备，勤勤恳恳地忘我劳动。这个“晨呼队”，激发了全县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表演话剧，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38年，在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推动下，资中全县人民觉醒了。在“抗敌后援会”宣传组的组织下，每周星期六晚上，各中小学的宣传队都在大东街“公共大礼堂”演出抗日节目，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每到星期六晚上，“公共大礼堂”灯火辉煌，城区人民扶老携幼，争相到剧场观看演出，场场座无虚席。特别是蔡锐修、张硕成等改编的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歌剧《游击队之歌》最受人欢迎。

在“抗敌后援会”的支持和学生会的配合下，由省六中高六班学生张硕成、高八班学生蔡锐修导演，在城区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宣传团结抗日的真理。

1938年5月30日，“抗敌后援会”作出决定：“利用‘五·卅’惨案节日，组织文艺宣传活

动，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省六中高八班学生官钧自编自演《残杀工人顾正红》。他扮演“叫化子”，穿着褴褛的衣衫，端起香盘，拄着拐杖，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声声诟骂可恶的日本鬼子象刽子手一样。事情发生在1927年的上海纱厂，日本侵略者残酷无情地惨杀我国工人顾正红……沉痛的语言，血泪的控诉，使许多男女老少听了之后深受感动。有的人掏钱丢在香盘上，有的妇女捧起香茶请“叫化子”喝，有的端起凉面让“叫化子”吃，有的投送糖果饼干，有的妇女给“叫化子”扇凉风，有的群众紧跟在“叫化子”后面反复倾听叫骂声。大家都称赞说：“唱得好，唱得对，唱出了我们的心愿。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随后又控诉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件，蚕食鲸吞我东北三省的罪行。日本鬼子烧毁我家园，抢劫我财产，奸污我妇女，残杀我无辜群众，使许多男女老少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耕，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这个控诉，更增强了全县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更鼓舞了全县人民保卫祖国的决心。

三、编写《恐日病》话剧，讽刺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日的卖国行为。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幌子，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措施，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侵占了东北三省之后，立即长驱直入。国民党不战而退，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使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得心应手，很快就攻下华北地区，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濒于覆亡之境。与此同时抗日救亡运动，更一浪高过一浪。

“资中抗敌后援会”不断抨击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罪行。学生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忧，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官钧曾编写《恐日病》独幕剧，经杜丽生老师审核，在校刊上登载。这个剧情是写剧中主人翁翁文光生病，卧床不起，双目紧闭，怕见阳光。后请名医钟振诊治，确定为《恐日病》。处方是金银散和防风散各服一剂；其次是要常将病人搀扶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暴晒，去掉“恐日”心理，提高抗日能力。剧本主旨，一是动员全国人民捐款购买飞机，加强空防；二是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这类幽默的话剧，虽未获得大量排演，但也给了阅读者一定的启发和教育。因此，编写《恐日病》的人，被国民党当局列为“共匪”之流的人物，险遭谋害。

四、组织抗日歌咏宣传队。

资中抗敌后援会宣传组还组织了两个歌咏宣传队：省六中宣传队，由蔡锐修任队长；县女中宣传队，由李云裳任队长。每到逢场和节假日，两个宣传队都到街头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的歌声，打破了资中的沉寂，激起了全县人民的抗日情绪。

五、募捐寒衣，支援灾区人民。

1938年，河北发生特大洪灾，当地群众遭受重大损失，房屋倒塌，庄稼被淹没，家具被冲走，男女老幼到处逃荒要饭，惨不可言。《大公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自动捐献，赈济灾民。国民党省党部派××来资发动有关单位设法支援。省六中和县女中的抗敌后援会组织人员进行募捐寒衣，支援灾区的宣传活动。一方面用自编自演的荷叶、金钱板、花鼓、柳连柳等文艺形式到茶房、酒店、餐厅进行宣传；一方面编排话剧、组织歌咏，在大东街公共大礼堂轮流演出。海报贴出有《放下你的鞭子》、《募寒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日本侵占我河山》等革命戏剧、歌曲。城区职工和附近居民看见节目新颖，内容丰富，男女老幼互相邀约，争先恐后地到剧场观看演出。当开幕式序幕拉开时，悦

耳歌声清脆悠扬。演唱《募寒衣》的歌曲时，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秋风起，秋风凉，人民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这个歌子说明了募寒衣的重大意义，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观众听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有的当场捐献寒衣款；有的在演出结束后，自觉地乐捐。演出结果，共收入寒衣款八百余元，随即如数汇交河北省赈灾委员会。很多观众反映说：“这个演出，既募捐了寒衣，发扬了团结友爱精神，又激励了群众，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怒潮。”

“抗敌后援会”在资中活动不久，作了大量的爱国宣传工作，表现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比愤恨，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但国民党反动当局把“抗敌后援会”看成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千方百计地要扑灭这团革命烈火，所以刚开展两年时间的活动，就被他们禁止了。可是，“资中县抗敌后援会”的光辉事迹确给人们留下了经久难忘的记忆。

官 钧 王志康 蔡锐修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三七年省中学潮后记

一九三七年上期，省立资中中学发生的一次学潮，其背景、起因、经过、结局，王志康同志在《资中县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已撰文记述，且颇为翔实，对这些方面就不再赘述。本文所记系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全校学生罢课离校后的几件重要事实。

动用武装占领学校

一九三七年上期，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派杨述来省中接替杨戢五执掌校务，学生极为不满。而杨所聘教师中，具有真才实学者固不乏其人，而滥竽充数者亦大有人在。开学仅几周，高初中各班就轰走了几个不称职的教师。因此，各班学生纷纷要求学校改变现状，更换一批不称职的教师。可杨述不仅不顺应舆情，反而老羞成怒，倒行逆施，用高压手段压制学生。开学不几周，被挂牌记过、警告的学生就有好几人。

学生厌恶杨述，地方教育界实力派急欲驱走杨述，军事教官刘多勋又从中怂恿，于是一场“赶羊”（即赶走杨述之意）的浪潮在省中兴起。

一九三七年四月，“赶羊”运动已经酝酿成熟，学生与杨述的矛盾已经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四月三日，初中二十五班一个同学与教务长的顶牛，就成了这次学潮的导火线。

四月四日早上，学校张贴出不少驱赶杨述的标语、对联。一个钟头后，全校住校学生一齐搬出学校，开始总罢课，抗议杨述迫害学生的行动。杨述猝不及防，不知所措。下午两点，学生会主席林荫修、郝作朝在科学馆外召开留城学生大会，揭露杨述办学的种种劣迹，阐述罢课纲领，宣布这次罢课的领导成员及各班联络员的名字。接着宣读了《四川省立资中中学罢课宣言》（宣言系高三班学生康光鉴起草），林荫修代表学生会号召全校同学团结一

致，争取罢课胜利。由于高中第三班与初中二十三班均系毕业班，同学要参加全省的会考，决定暂不离校，继续留在学校上课，掌握校方动态，更好地与杨述周旋。

大会后，各班学生立即离开学校，平时书声琅琅的学校，顿时变得一片沉寂。

下午三点半，由高三班的联络员刘利模、王秋成、蔡定炽，初中二十班的联络员蔡锐修、廖正华等在科学馆阶梯教室召开高初中毕业班学生大会。刘利模作了较详尽的讲话，说明高初中毕业班留校上课的理由，表明支持罢课的态度。王秋成说：“我们这次行动是一个择师运动，我们有选择良师的自由，只要杨述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不一定要离校。高初中毕业班同学要团结一致，迫使杨述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

下午五点，我们散会后，正准备离校。突然，保安司令部开来了两中队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士兵。他们冲进学校，端着步枪，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如临大敌。这些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迅速占领了学校的教室和宿舍。“东西楼”、“圈楼上下”、“深居洞”等宿舍的每间寝室，都有两个保安队士兵持枪守卫；大门内外及学校各寝室、交通要道都布满了岗哨，对来往学生进行盘查，并规定学生准进不准出。我们目睹这种情况，赶紧找高三班联络员商量对策。经研究决定：初中同学集合整队冲出校门，让守卫校门的保安队前来拦阻，同学们即在大门内外与士兵争吵，让街上行人围观，制造舆论，把杨述派兵镇压学生的种种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高中部同学则齐集教职工会议室，找杨述出来答话，提出三个条件：一、立即撤走进驻学校的保安队士兵；二、保证同学的人身安全；三、追查并惩办派兵进驻学校的主谋者，保证以后不发生同类事件。如果杨述不答应这些条件，就当场宣布罢课，高初中毕业同学和全校同学一道一齐离校。

我们按照这个决定分头行动。我带着初中同学冲出校门，四个持枪守卫大门的保安队士兵果然上前来拦阻，但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会几十个人一齐冲出来，这使他们猝不及防。半数的同学已冲出校门，半数的同学留在校门内与士兵争吵。街上行人见此情况，便都驻足围观。已经冲出校门的同学，便向围观群众揭露杨述派兵镇压学生的罪行。围观的人愈来愈多，都指责杨述的不是。守卫大门的士兵见状，自知理屈，便向我们说：“我们是奉长官的命令来站岗的，你们去找我们的长官讲道理。”就这样两边的人在校园内外争持不下。

高三班的同学在一个职员的寝室里找着了杨述，向他提出了我们的最后通牒。杨述听了顿时大惊失色。原来进驻学校的保安队是杨述到保安司令部请求保安副司令王荣庆派来阻拦其他年级学生离校的。当时，专员王梦熊并没有同意，后经杨述不断央求，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几个重要头头几经研究，才迟迟派兵来学校。因此保安队开到学校时，其他年级的同学早已离散，保安队扑了一个空。而学校留下的两个毕业班是杨述向上讨价还价的资本，因为他可以向上呈报，省中学生只部分离校。现在其他年级的学生一个也没有拦住，两个毕业班的学生又要全部离校，这就丧失了他手头仅有的一点筹码，他怎不感到伤心呢？

由于这些原因，杨述在处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地答应了同学的要求。对于保安队开进学校的事，杨述佯装不知，假惺惺地说：“我不知道专署会派保安队来学校，但我了解他们不是针对高初中毕业班同学的，既然你们提到，我一定到专署向王专员请求，把保安队撤出学校。希望你们留校安心读书，马上你们就要参加会考了，要以学业为重。”接着他又说：“现在我立即去找他们的带队长官，告诉他们，高初中毕业班同学可以自由出入学校。”

不多久，一个背着红值星带的连长（中队长），站在学校二门口（稽查室外的大门口），高声向守卫大门的卫兵喊：“放他们出去，他们是高初中毕业班的学生，可以出去；其他班

的学生一个也不准出去！听到了没有？”守门的士兵齐声回答“听到了！”

这样，我们带着胜利的微笑，走出了校门。

深夜静悄悄，进驻省中的两连保安队，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撤走了。

逮捕学生 进退维谷

进驻学校的保安队士兵被赶走以后，杨述的处境已十分尴尬，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的一天（这天是某一周的星期一），上午七点多钟，省中初二十三班的同学陆续来到学校。先来的同学站在校门外，等候同学到齐后一道进学校上课，因为怕发生意外。我和张瑞成、张永威、廖先英、凌威熙等同学七点正就来到校门口，坐在学校对面“孙花生”（资中出名的卖花生的老店）店铺外剥花生。一个同学忽然看见学校进大门的左手墙壁上贴有一张专员公署的布告。布告内容是命令学生三日内返校上课，并告诫家长督促学生返校，如延误返校时间要分别情况给予不同的处分。我班同学王大坚（资中罗泉镇人）看后，边走边骂，他向我们转述了布告内容后，我说：“给他撕了！”王大坚即回转身走到校门口去撕布告。布告刚一撕下，斜地里却跑来两个身穿长衫的大汉，将王大坚一把拉住，反剪着王大坚的手，声嘶力竭地嚷叫：“抓住撕专署布告的共产党了！”我们见状，立即上前抓住这两个人，斥责他们不应该在学校门外贴布告，更不应该到学校抓学生。两个大汉说：“我们是保安司令部的谍查，他是共产党，撕了我们专署的布告”。初生之犊不怕虎，我班的同学都挺身上前拦住特务，冷嘲热讽地说：“啊！原来你们是‘沱茶’”（“谍查”即土特务，当时资中人对这类人蔑称为“沱茶”）。你们既是‘沱茶’，请把证件拿出来”。可这两个便衣特务竟拿不出任何可资证明身分的东西。于是几十个同学紧紧地包围着他们，并松开了王大坚的手，想轰走这两个特务。但是，这两个特务不甘心失败，死死扭住王大坚同学不放。这些特务平时横行霸道惯了的，口口声声叫嚷要把王大坚拉到保安司令部去。同学们被这两个家伙仗势耍横的恶劣行径所激怒，齐声叫喊：“不准他们到学校抓人！拉他们到校长那里去说理！”话音未落，十几个同学便上前去扭住两个特务，拉的拉、推的推，把他们推进了学校大门。

就在这时，住在附近街上的其他班的一些同学，闻讯赶来学校助战。同学们愤怒极了，有的大声喊打“沱茶”；有的在特务背后打“冷锤”。就这样推推打打地把特务推进了二校门。

同学们刚把两个特务推到图书馆外走廊上，聚集在那里等候的一些同学，一拥上前，挥着拳头向特务打去，愤怒的拳头象雨点般地落在两个特务身上。一个特务实在忍受不住了，挣脱被压住的手，在腰间拔出手枪，伸直手臂，指向空中，高喊：“把我放了！再不放，我要开枪了！”在这紧急关头，同学们毫无惧色，十几只手把拿枪特务的右手举在头上，不能动弹；另外几个同学拦腰抱住他；又有几个同学把他的左手反剪在背后。我班凌威熙同学急中生智，跑至打钟的地方，拿着打钟的大头槌，在拿枪的特务头上连击两下，这个凶恶的特务立即昏倒在地。

我们拿着缴获特务的手枪，挟着这受伤的特务，押着另一特务来到校长办公室，义正词严地质问杨述，揭穿他与特务合谋陷害学生的阴谋。杨述矢口否认。两个特务也叫嚣着要把王大坚带走，并诬蔑同学扯他们的枪，要杨述交出打人的学生。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冲着特务说：“不准‘沱茶’歪曲事实！不准‘沱茶’诬蔑学生！”一些同学在门外大声喊叫：把“沱茶”拉出来打！我们愤怒地斥责杨述出尔反尔，要杨述真正保证学生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杨述被迫地向学生再一次作出保证，并向两个特务说：“今天的事情是出于误会，冲突的情况还须进一步了解，请你们暂时回去。等下，我与王专员和王副司令联系，研究解决的办法”。两个特务仍坚持要杨述交出打人的学生，接着外面又是一片喊打声，两个特务见学生人多势盛，怕吃眼前亏，便向杨述说：“杨校长，我们是奉上面命令来的，我们不带人回去，恐怕交不了差，你要负全责。你能保证我们要的人随传随到吗？”杨述说：“行”。两个特务才悻悻离去。

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政治上很不成熟，我们赶走了特务，取得了杨述的保证，便以为已经取得了胜利，没有将王大坚同学安置好，保护好。这天晚上，住在大东街新城隍庙（现食品公司仓库）隔壁龙江茶社楼上一个同学的宿舍里的王大坚已经睡了，保安司令部的谍查借查号为名，于深夜十二点钟将王大坚同学抓走，赓即丢进大监（即关押重要人犯的监牢）。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莫不义愤填膺。我立即与高三班的联络员联系，经商定，两班分别开会，同时行动，即时开始罢课，散发快邮代电，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在学校等齐同学后，便一齐到东门外罗汉洞开会。我们刚走出东门，几个便衣特务便尾随着我们。我们一路唱着聂耳谱写的《毕业歌》，向特务示威。在罗汉洞的会议上，同学们慷慨陈词，决心与杨述周旋到底。回校后，我们印发了快邮代电，敦促杨述立即放回王大坚同学。

高初中毕业班学生同时罢课，不啻给杨述一记当头棒喝。《省立资中中学全校学生为驱逐校长杨述举行总罢课告全川父老书》的快邮代电在全省各地散发，重庆、成都两地的两资同乡会（两资包括资中、资阳）、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的同乡同学会支援罢课的函电纷至沓来，杨述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而这时四川各地大、中学的学潮正方兴未艾，已把四川省教育厅的当权者弄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力量来解决杨述的问题呢？由于这些原因，解决省中学潮的大权就落在专员王梦熊身上。

王梦熊是蒋介石亲信贺国光的小舅子。贺最先带蒋介石的中央参谋团进入四川，在四川搞了很多坏事。王梦熊也是随参谋团入川的（临解放前，贺国光作西昌行辕主任，王梦熊任参谋长，后随贺逃往台湾）。王梦熊为了搞垮杨述，认为省中学潮是杨述办学无方，处置不善引起的，极力否认学潮是共产党搞起来的，因而主张撤换杨述以平息学潮。

王梦熊定下解决学潮的基调，资中教育界的实力派又配合学生四处制造舆论，甚至有的人公开扬言要取而代之。杨述自知校长的乌纱帽已难保存，为了顺应舆情，不得不把杨戩五作校长时的地理教师彭毓方请出来，给以训育主任的名义，作杨述的全权代表，与学生代表及地方实力派折衷谈判，务求体面下台。

四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资中的“五老七贤”阮甸韩（曾作过四川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的秘书长）、王兰坡（曾作过四川某地道台）、张岷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当时资中的财务委员长兼商会会长）等联袂来到省中会议室，与专员王梦熊及杨述、彭毓方研究结束学潮及复课等事宜。几经折衷，地方实力派保证动员学生返校复课，专署保证无条件释放王大坚；学校保证不开除一个学生，而且根据学生的意见，更换几个不称职的教师。接着由彭毓方出面，首先召集高初中毕业班的学生开会，传达三方协议的内容，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立即复课。对于王大坚的处理，彭毓方反复解释，希望同学谅解，体念杨述的困难处

境。因为两个特务被同学们打得周身青肿，不给记大过的处分，保安司令部的人不答应，要毕业班同学以大局为重。结果王大坚被挂牌记大过三次。第二天城区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学生返校复课”的大标语。

各班学生陆续回校上课后，杨述自知理屈，无颜再见学校师生，即深居简出，不再抛头露面。学校大小事均交彭毓方代行，暑假一到，杨述即被免职。

至此，一场以“驱羊”为核心的择师运动胜利结束。而这场规模盛大的学生运动，其意义远不只是撵走一个杨述，它给抗日战争后的资中县女中的两次学潮、资中师范的学潮及省中的两次“打鱼”运动（打击校长余尊三、余沛华）打好了思想基础，提供了斗争的方式和方法。这一切，在资中的学运史上，无疑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蔡锐修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资中人物志

蜀自文翁倡教，人材之盛，比于齐鲁。州滨沱江，山水钟灵，人文蔚起，以道德文章冠冕士林者，汉唐以降，代不乏人。

州人士出仕于外，实繁有徒，往往有兴利除弊，泽及民生，讴歌遍于当时，称颂及于后世。

石室讲学，文教日昌，吾资地位蜀南，亲承雅化，诗书之气，入人尤深。学识渊博，经术湛深，照耀史册，模范后儒者彬彬感焉。

吾资民性敦朴诚实，忠义之士甚众，如捍卫乡里，义不降贼，牺牲性命而不悔也。

州人于科技有一艺之长者志不绝长，特别医术精深，而又以济世活人为务者实符“医乃仁术”之旨，共事可待也。

苕 弘

苕弘，周大夫。《礼记》孔子尝问乐焉。《孔丛子》弘语刘文公曰：“仲尼有圣人之表。”弘之著述见于《汉书艺文志》，弘有十五篇。时周力少，诸侯莫朝，弘为晋赵鞅所杀。《庄子外物篇》苕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图经》苕弘，资中人，有祠在青泥坊，数里之内，土色尚青。柳宗元《吊苕弘赋》：“大夫死忠兮，君子所与。呜呼哀哉，敬吊忠甫。”

王 褒

班固《前汉书·本传》，王褒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

好，徵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才刘向、张子侨、王褒等待召金马门。

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益州刺史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才，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益州刺史因奏褒有枚才，上乃徵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兹摘录文中警句如下：

“臣僻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顾有至愚极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指，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昔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圉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生风，龙兴而致雨。”“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获稷、契、皋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会神，相得益彰。”

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官馆，辄为歌颂，议者以为淫靡不急，上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女工有绮谷，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欢。”顷之，擢褒为谏议大夫。

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待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官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时宣帝颇好神仙，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按《元和志》褒为资中人。

王 延 世

王延世，字长叔，《华阳国志》资中人也。西汉成帝建始时，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赵 逵

赵逵，字庄叔，《宋史·本传》，其先秦人，八世祖处荣徙蜀，家于资州。逵读书数行俱下，尤好聚古书，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与当代名人巨公出处大节，根穷底究，尚友其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对策，论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时秦桧意有所属，而逵独当帝意，桧不悦。逵就校书郎职，未尝私谒，桧意愈恨。逵赓御制芝草诗有“皇心未敢晏安图”之句，桧见之怒曰：“逵犹以为未太平耶。”又谓逵曰：“馆中禄薄，能以家来乎，”逵曰：“亲老不能涉险远。”桧徐曰：“当以百金为助。”逵唯唯而已。桧滋怒，犹挤之，未及而死。帝于景灵宫独见逵曰：“卿知之乎，始终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后，为大臣阻格，久不见卿。秦桧日荐士，未尝一语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诏充普安郡王府教

授，遠奏言路久不通，乞广賜开纳，勿以微賤为间，庶几养成敢言之气，帝嘉纳之。绍兴二十六年迁著作郎，寻除起居郎，入谢，帝又曰：“秦桧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遠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权奸，但不与之同耳。”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权门，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帝尝曰：“赵遠纯正可用，朕于蜀士，未见其比。”自秦桧专权，深抑蜀士，故帝语曰：“蜀人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用者不因论荐，无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遠以疾求外，帝命国医王济先视疾，不可为矣。卒年四十一岁，帝为拭泪叹息。帝又谓遠文章似苏轼，称遠为小东坡。

赵 雄

赵雄，字温叔，《宋史·本传》，资州人。隆兴元年类省试第一，虞允文宣抚西蜀，辟干办公事，入相荐于朝。乾道五年，召见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诏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将行，雄当登对，允文招与之语，既进见，雄极论恢复，孝宗大喜曰：“功名与卿共之。”即除右史。雄论恢复计，大略谓莫若由蜀以取陕西，得陕西以临中原，是秦制六国之势也。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蚕麦甚熟，丝米价平可喜。”雄奏孟子论王道始于不饥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论，耻言农事，微有西晋风。岂知周礼与易言理财，周公孔子何尝不以理财为务。且不独此，士大夫諱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据，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存大有为敢不布尧言书之时政记。”淳熙五年三月参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绍兴帅张津献羨余四十万缗，雄乞降旨下绍兴，以其钱为民代输和买身丁折帛钱之半，使取诸民者民复得之，足以见圣主之德。自雄独相，蜀人在朝者仅数十人。有言雄私里党者，雄求去，诏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选才无乡旧，盖有所激也。上思雄不忘，使雄知江陵府，江陵无险可恃，雄请城江陵，城成而民不告扰。光宗将受禅召雄，雄上万言书，陈修身齐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绍熙四年雄病死，年六十五，赠少师，嘉定二年謚文定。

魏云泉烈士事略

魏烈士云泉，资州人。留学东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云泉痛恨清政腐败，非改革不能救亡图存，因于光绪乙巳年于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宣统庚戌秋，云泉学成归国，任成都各校教员，暗中联络爱国志士，如唐宗尧、潘大道、熊峰等协计革命工作，并将国内情况及斗争策略，条陈中山先生，颇蒙嘉许。

辛亥秋，保路事起，云泉义愤填膺，与同志会领导人号召全川，一致奋争路权，树举义旗，各县同志会纷纷响应。由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张培爵任四川民政署长，云泉任四川都督府及民政署政治高等顾问。云泉旋代表四川驰赴南京，参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召集的各省代表会议，商谈国是，云泉晋謁总统，报告四川首义情况，更条陈兴革要政诸大端，蒙总统嘉许。

未几，孙中山辞总统去。窃国大盗袁世凯任总统后并阴谋帝制，云泉与张培爵、邹汉卿

等同志密谋锄袁，出入虎穴，毫不畏惧。不幸事未成而为袁贼所觉，张培爵被捕于天津，越五日云泉被捕于北京。

云泉之夫人罗××曾偕云泉留学东洋，毕业于日本高等女子精华学校，并与云泉同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共事革命工作。云泉在禁中语其夫人曰：“吾得捐躯报国，千古殊荣，惟冀吾妻慎节哀痛，善为抚育儿女，读书革命，以竟吾未竟之志，则吾死而有知，自怡然无憾矣。”

民国四年旧历正月十九日，云泉与张培爵、邹汉卿等烈士同被害于北京刑场，云泉时年三十二岁。

云泉被害后，由其师清季状元骆成驥挺身为收其尸，殓殡于北京四川义地。云泉被害时，其夫人在北京被袁贼监视，仍由骆状元承保回川。骆“燕台”诗曰：“万里还携孤寡去，三年别抱苦辛来。”就是指骆与孤寡是一起回川的。

民国五年，黎元洪总统明令各省查报先烈勋绩，四川督军罗佩金将魏云泉、张培爵、邹汉卿等殉国殊绩，呈请一体追封给卹，并公葬，均蒙核准在案。

周叔平

《藏汉大辞典》编者之一——杨承丕事略

现在，正在北京民族出版社付印的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大型双解辞书《藏汉大辞典》，不日将与读者见面。这部辞典的成书是我国少数民族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幸。这部辞典的诞生是不少藏汉民族编写人员长期呕心沥血，团结协作的产物。资中一中校友，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藏族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杨承丕同志，就是这部辞典的汉族编者之一。杨承丕同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于这部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默默无闻地为辞典贡献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不幸，在辞典行将问世之际，这位为之殚尽辛劳的编者却猝然与世长辞，未能亲见辞典出版，实为憾事。杨承丕作为一个民族科研工作者，将毕生精力倾注在辞典编纂工作上，其勤勤恳恳为辞典所作出的辛劳值得记叙。

(一)

杨承丕（1925年—1984年）四川省资中县人，1925年3月8日出生于资中水南街。父亲杨六泉以中医为业，因不善蝇营狗苟，虽医术高明也免不了穷愁潦倒，困顿一生。杨承丕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四岁从塾师三年，十三岁上小学，因家境清贫，时辍时学，十五岁始就读于资中县男中。1944年初中毕业后考上省立资中中学（今资中一中）。47年秋高中毕业，是年其父病故，兄雪松正就学南京，举家生计无着，无力升学，只好在当时的私立岭南中学训育处作职员，此外还在水南街凤至小学任教，晚上则与李姓学生作家庭教师，以此维持家庭生活。48年秋，二十二岁的杨承丕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因家贫无力缴纳昂贵的学

膳费，辍学一年。49年其兄学成回川，担起家庭生活重担，才得以有机会到川大复学。1953年毕业于川大中文系。

川大毕业后，杨承丕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煤矿工会研究室工作。1954年10月调秦皇岛煤矿工人中学任教。此学校名为中学，实则学生都从扫盲开始。杨承丕在此校工作三年，根本谈不上发挥所长，大有学非所用，报国无门之感，苦闷至极。1957年秋，四川大学与之联系，希望他能回校参加张怡荪教授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一个基本上属于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当然愿意发挥所长，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起点作用，于是欣然前往。57年11月回到四川，参加川大中文系藏汉辞典组工作。1958年9月，川大藏汉辞典组划归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领导，杨承丕又随辞典组调到科分院。1963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成立，杨承丕又随辞典组调至民研所，继续从事辞典编纂工作，直至逝世。

(二)

《藏汉大辞典》是一部收词五万多条，约三百万字的巨著。该书分语词和百科两部分，其内容既广泛涉猎文学、历史、语言、佛学、因明、医药、历算等学科，也包括了整个藏区的风俗和手工生产、器用服饰、工艺建筑、赋税差徭、租赁借贷诸行话，是一部既能提高藏语文水平，又能普及百科知识，帮助读者阅读藏族历代文献，扫清文字障碍的藏汉双解辞书。此书于发掘藏族文化宝藏，促进藏汉两族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有重要意义的事，杨承丕很乐意去做。但作为一个汉族人，仅在大学时选修过藏文课，对藏语文只能算是刚刚入门，对藏族文化更说不上有什么了解，却要担任这部巨著的编纂工作，那无疑是困难的。而主编核书的教授张怡荪先生在物色人选时却看中了他，邀他参与其事，这是不无原因的。先是杨承丕在川大听张先生的藏语课时，那字迹清晰，一丝不苟的听课笔记所反映出的刻苦精神和严谨学风，给张先生留下了较深印象。张先生主编辞典需要助手时，指名要他回校编纂辞书。张先生之所以器重他，主要在于他学习的刻苦和治学的严谨。编写辞书，要从资料中抽绎出正确的东西，不仅是通晓藏语文所能解决的，还得相应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杨承丕的藏文仅系初学，但却有较深厚的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基础和较为广泛的知识面，这是张先生器重他的又一原因。张先生认为杨承丕的藏文水平低，可以边干边学，逐步提高。杨承丕进辞典组后，张先生鼓励他“坐冷板凳”，重作小学生，一切从头开始，并交给他一部藏文本的《菩提道次第略论》，亲自给他讲授；另外还安排一位藏族同事洛桑曲扎给予辅导。杨承丕对藏文的学习始终象个小学生，凭着他的革命事业心和学而不倦的钻研精神，较快地具备了能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

当时，杨承丕学习藏文的条件是很差的，首先是工具书难得，其次是没有时间。没有工具书，他就四出搜求，辗转托人求得二十年代印行的杨质夫编的对勘性小辞典，及藏族学者格西曲扎编印的《藏汉辞典》，才旦夏茸的《藏汉词汇》和印度人达斯著的《藏英辞典》。这些工具书，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蹒跚学步的拄杖。他把获得这些工具书视为享有一注财富。他依靠这些工具书，挤出所有业余时间，刻苦自学。同时，通过搜集、整理藏族历代文献、各种藏文古字书和《正字语灯论》、《正字宝匣》一类藏语文正字法书籍，他丰富了自己的藏语文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他留心藏族各类方言、习语的使用，注意向组内的藏语同行和平时接触的藏族同胞学习日常口语，尽可能以听、说促读、写，扩大词汇量，从而提高

笔译水平。尽管那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南来北往的车旅生活，都没有影响他的学习。

(三)

杨承丕同志的藏文日益精进，对藏族文化有较深刻的了解，主要还在于他为时四年的藏区生活。

1958年9月，杨承丕同志随张怡荪教授，受科学院派遣到西藏搜集资料。体质孱弱的杨承丕，为了藏汉两族的文化建设，置个人困难于不顾，不怕高原生活艰苦，从1958年至1962年，在拉萨一住就是四年。四年中他未曾回过家，即使是61年他护送已年近古稀的张老教授回成都，一直送到甘肃柳园铁路上，本来可以顺便回家探亲，可是为了工作依然返回拉萨。

在拉萨，杨承丕的主要工作是为大辞典搜集资料、译稿、写稿，也兼管一些行政事务。在搜集资料工作中，他负责深入民间，采访有关丧葬、修建、狩猎等方面的活语言。主编还指定他编写藏医针灸穴位词汇。他不懂医，但却欣然接受这一艰巨任务，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广泛阅读医学典籍，终于成功地编写出藏医针灸穴位的词汇。

西藏平叛前后，社会情况复杂，秩序混乱，加之气候恶劣，生活不惯，语言不通，他却不顾一切，冒着危险，经常出入于藏族聚居的地方，去了解社会习俗，生活用语，而且长途跋涉，到远离拉萨几百里的墨竹贡卡地区，蒐集活语言和各种行话。通过他的努力，搜集了藏语方言中不少表现力强，又颇有生命力的词汇。

从1958年到1962年，《藏汉大辞典》编写组，在西藏党政领导关注下，收词包括政治、法律，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文法修辞，历史地理，医药、历算、文艺，乌拉制度以及社会习俗，生活用语等三十二项，完成了大辞典稿本的四分之三。杨承丕为这四分之三的稿本，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也编写过一些词目，为双解辞书开创性的工作，架桥铺路，贡献了绵薄。

藏族文化深受佛教影响，研究藏汉文化，不能撇开佛教哲学。他深知，阅读藏文典籍，佛学词汇是最大障碍。因此，他重视佛教哲学及戒律方面知识的学习。通过搜集仪轨、神佛、经籍、器物等宗教词汇，他积累了不少藏汉佛学知识，对藏族文化逐渐有所理解。他近年来写的研究西藏文化的几篇文章：《格西——西藏僧侣的一种学位》、《书写藏文的文房四宝》、《西藏的佛教》、《藏文的书法》等就是那时所获得的知识。

(四)

1962年《藏汉大辞典》编写组从拉萨回到四川，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杨承丕同志负责辞典稿本校对和清缮工作。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一切科研工作停止，民研所解散，辞典组借调人员纷纷回原单位，仅留下主编张怡荪、副主编祝维翰和杨承丕及一位姓黄、一位姓胡的辞典组基本成员。8月，第一张大字报“大毒草藏汉辞典”把辞典组完全轰下马；第二张大字报“反动权威张怡荪及其师徒班子”，杨承丕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徒子徒孙。好在他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才幸免于难。